

永生的面包树

——梁实秋故居的失修与复活

□许志杰

梁实秋先生曾经担任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外文系主任，他在山大青岛校区旁的小鱼山留下了一个作为故居的小院。据说，当年同在山东大学任教的闻一多先生是这个小院的常客，梁实秋还专门从北京买了一个烤肉的炉子，用来招待客人，闻一多、沈从文和作为山大学生的臧克家，都品尝过梁先生的烤肉手艺。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梁实秋应聘到台湾担任国立编译馆馆长，之后又担任过台湾省立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云和街11号，就是现在的“梁实秋故居”的这所房子建于1933年，初为台北高等学校一位英语教授的宿舍。梁实秋在这里住的时间并不长，这里只是他担任师范学院英语系主任时的住处，他搬离之后又陆续有台湾师范大学的教授住进。后来因无人居住，一度破败得只有梁实秋居住时植下的那棵面包树还在坚守，似乎是对过去主人的思念和等候。2003年，在一些文化人士和师大师生的共同呼吁下，台北市文化局将其指定为历史建筑物。但是，主人已经换了儿孙，而作为影响最大、最有看点的梁实秋，其后人要么失散，要么去了别处，并不在台湾，所藏旧物委实太少。在其被定为历史建筑物之后，又在风雨飘摇中等待了七年，很多木质的建材开始腐烂，甚至成了周遭乱扔垃圾的地方。在经过努力之后，台湾师范大学立项对梁实秋故居进行复修，于2012年整修完毕，当年即对外开放，民众可直接入场参观。

梁实秋刚到台湾时，人生地不熟，有一些孤单，因此，他把时光主要打发了在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上。这项工作起于梁实秋在山东大学任图书馆馆长和外文系主任之际，后来受国内局势影响，他颠沛流离、动荡不安，但始终没有放弃。到了台湾之后，在日子稍微平和之时，梁实秋先生就给自己制定了详尽的工作计划，每天要翻译2000字。经过近30年断断续续的不间断努力，梁实秋翻译了莎士比亚四百万字的全部剧作和三卷诗歌，还完成了一部一百多万字的《英国文学史》，主编了《远东英汉大辞典》以及三十多种英文词典和教科书，堪称中国翻译史上的一大奇迹，为英国文学在远东地区的传播做出极为巨大的贡献。

深居台湾的梁实秋对外界之事了解不多，在内地轰轰烈烈地进行“文革”之时，梁实秋不知从什么渠道得知冰心与丈夫吴文藻双双服毒自杀的消息，很是悲痛，写下一篇《忆冰心》的文章，回忆两个人几十年的友情。梁实秋与冰心结识于1923年8月，那年他们一起从上海登上



了开往美国的轮船。冰心因为发表《繁星》与《春水》两部诗集，名气很大。梁实秋则在《创造周刊》撰文批评冰心的诗作理智多于情感，因此断言冰心不是一位热情奔放的诗人，只是泰戈尔小诗影响下的一个冷隽的说理者。在轮船的甲板上，梁、冰不期而遇，经作家许地山介绍，他们开始寒暄。冰心问梁实秋：“您修习什么？”梁实秋答：“文学批评。”二人的对话就此打住，但是，旅途漫漫，为了消除寂寞，冰心联合梁实秋、许地山等人在船上办起了壁报，名字叫《海啸》，三天一期，张贴在客厅入口处的旁边。冰心的几首著名的诗作《乡愁》、《惆怅》、《纸船》，都是初发在《海啸》上。梁实秋满怀深情写下的《忆冰心》见报后，女作家凌叔华给他写信，告知这是一个假消息，冰心、吴文藻夫妇活得好好的。梁实秋见信甚感过意不去，却又因是误传而由悲转喜，一笑而过，留下文坛一则不朽的“笑话”。可能是为了弥补这一“过错”，1982年，女儿梁文蔷回北京的时候，梁实秋托女儿带给冰心、吴文藻夫妇一幅书法作品，上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

还有一件事，上世纪70年代初，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让梁实秋推荐汉语作家，他推荐了老舍。岂不知，他的这位山东大学同事早在1966年8月24日跳入北京太平湖“自绝于人民”，而诺奖的候选人必须是健在的人。从这两件事可以看出，梁实秋虽然心系旧友亲朋，却已远离时事漩涡，成为“孤陋寡闻”之人。

经过整修的梁实秋故居基本保持了原来的面目，布置有介绍主人的海报，包括梁实秋先生生平、故居的整修过程，还有梁先生的著作，当然，还有那棵永生的

面包树。故居整修完毕开放之后，梁实秋的女儿梁文蔷从美国回“家”，看到院子里那棵面包树旺盛地生长着，非常激动。梁文蔷说：“面包树是我母亲亲手种下，母亲逝世后，父亲常常提起面包树，它是母亲生命的延续。”梁文蔷的母亲程季淑是梁实秋先生的第一任妻子，两人自由恋爱，在北京结婚。在简单的婚礼过程中，梁实秋因为戒指太松，不知何时自动脱落丢失了，梁实秋非常自责，新婚的程季淑赶忙劝慰：“没关系，我们不需要这个。”婚后两人感情甚笃，程季淑鼓励梁实秋继续翻译莎士比亚全集，他翻译，她就为他整理、装订书稿，付出很多精力。梁实秋曾经深情地说：“翻译莎翁著作是一个浩大的工程，在这漫漫长途陪伴我的只有季淑一人。”梁实秋与程季淑相依相守46年，1972年程季淑在美国因意外过世，梁实秋悲痛万分，写下《槐园梦忆》一书。两年后，71岁的梁实秋与43岁的演员韩菁清相识，并陷入热恋。那些正被《槐园梦忆》催得泪水横流的人，立即站出来反对，梁实秋的学生更是组织“护师团”，发誓阻挠梁师的这段黄昏恋。但是，这一老一少不顾世俗与偏见，于翌年结婚，经受了13个春秋的考验，直到1987年梁实秋因心肌梗塞在台北病逝。

1973年1月6日，侨居美国的梁实秋在自己70岁生日的当天写下词一首：“恼煞无端天未去，几度疯狂，不道岁云暮。莫叹旧屋无觅处，犹存墙角面包树。目断长空迷津渡，泪眼倚楼，楼外青无数。往事如烟如絮，相思便是春长验。”那时候，旧屋无觅处，先生空悲叹。如今旧屋已换新颜，该令梁公感到欣慰吧。

(本文为作者为媒体从业者、知名专栏作者，出版作品多种)

心机学

梁思成会哭

□王乾荣

上世纪60年代，我小青年一个，爱读各报副刊。《人民日报》副刊有个《拙匠随笔》专栏，作者是建筑学家梁思成。

那时没有“追星”这词，但小人物也有自己的明星。我们的明星不光有赵丹、白杨，还有巴金、老舍，更有钱学森、华罗庚……我特别钦佩那些科学翘楚，他们不光在专业领域独领风骚，还有优美的文笔。梁思成的《拙匠随笔》吸引我，首先在它的名称。梁先生明明是首屈一指的建筑大师，为什么自称“匠”呢，还“拙”？

匠，一般指手艺人，也叫匠人。但有思想、有所发明创造的能工巧匠，人称“哲匠”，如鲁班。梁先生说自己是“拙匠”，透着十分谦逊的意味。但他这个“造房子的”，却不是一般的泥瓦匠。

《拙匠随笔》有篇从建筑谈“千篇一律”和“千变万化”关系的文章，我现在仍记忆犹新。梁先生举颐和园长廊为例，说：它首先是“千篇一律之尤者”，而正是那目之所触似乎无可穷极的“重复”，才给人以大气、庄重、整饬的特殊感受——凡去过颐和园的游人，我想都会有这感觉。梁先生又运思设想，长廊齐刷刷几百根柱子，如果一根方，一根圆，一根八角，一根六角，一根肥，一根瘦，一根粗，一根直，一根红，一根绿……如此“千变万化”排列过去，将造成一种什么乱象呢？事实是，长廊虽然柱子“一律”，但是柱间回廊墙上的花窗却是各具特色，“千变万化”的。这是一种“大统一中的小变化”，既得花窗“小异”之谐趣，也无伤于长廊“大同”之整体美。且以这花窗大小的变化，作为廊柱“主旋律”无尽重复的“前奏”和“小插曲”，也是一种“欲扬先抑”、“融变于不变”的手法。文章以常见之物和通俗话语阐释哲理，像一首美妙的散文诗，令人在陶醉中开窍。这篇佳作，是我作文的范本，也是我哲学的教材。



回味梁文，不由想到咱们很多城市的规划和建筑。

有一段时候，街道两旁和居民区的楼房，一律“火柴盒”，像一个模子倒出的——猛看，整体上是“一统”了，但细瞧“火柴盒”们，个个灰头土脸，一样死气沉沉、无精打采，无任何变化。这就像主旋律中，单把一支小号在那儿没完没了吹出“哪——”这个长音，无休止，也没有细微涟漪波动。

现在的建筑设计倒是热闹了。一种是拆大建，且将旧郭变新城，玻璃幕墙，铝塑坚壁，一派亮丽，炫目耀眼，却是大的方面仍嫌僵化，小的方面彼此彼此。咱们从一座城市到下一座，到下一座，看到的，是千城一面，不知道啥叫民族风格，什么是城市特色。

一种是大的方面杂乱无章，小的方面千奇百怪。同一条街两旁建筑，整体看去，或犬牙交错，或高矮悬殊，或古今比肩。而个体的“千变万化”，则是另类之变化。您瞧一个个搞怪建筑，真是怪出了狂气、牛气、阔气、俗气、意气、邪气，叫人憋气。

在燕郊有一家酒店，外形为三个长髯古装人偶——分别叫福、禄、寿，身高40多米，吓人，似乎叫小民一旦近前，即必须匍匐，膜拜于神祇脚下；沈阳的方圆大厦，主体为一枚外圆内方、硕大无朋的古钱币——那钱眼比门楼大许多，像一张血盆大嘴，大到能把摩登设计师和大厦霸主统统吞下；南京一个区的政府机关楼，竟然盖成美国国会的样子……这些都是媒体报道过的，一些地方还有弄成靴子、酒瓶子之类杂七杂八模样的丑陋玩意儿，不胜枚举。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不要搞“奇奇怪怪的建筑”。无疑，这些奇奇怪怪的建筑是社会浮躁风气和某些城市主管者骄矜任性媚俗心态的产物，是某些建筑设计师缺乏美感素养和违背职业精神生产的垃圾。

梁思成若活在今天，一定欲哭无泪。

碎碎念

清明英雄山

□鲁黔

上世纪60年代清明扫墓时，老师率领着我们这帮少先队员——女生穿着裙子，男生上身着白色衬衣，打着队旗，从大明湖路步行约十华里去英雄山祭扫烈士墓。

“山鸟啼，红花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扫墓来。想起当年风雨夜，山冈铁镣响叮叮，不是你们洒热血，哪有今天的好光景……”那歌声使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眼睛润湿，也忘却了寒冷。在那个有追求和信仰的岁月，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

济南英雄山烈士陵园始建于1949年4月，至1968年建成，占地面积39万平方米，故此把原来的四里山更名为英雄山。四里山与五里山、马鞍山西麓连接在一起，这些山脉唇齿相依，天精地血的造化，早已是上万年的缘分了。

我们这帮1950年后出生的少男少女，怀着敬仰的心情，爬上山坡，终于来到先烈的墓前。在英雄山的南坡处，在苍松翠柏的掩映里，安葬着1502名革命烈士，其中第一排墓碑，当时应是四个，即王尽美、鲁伯峻、刘谦初、马保三。

直至许多年后，我方知他们的生平和伟绩。其中鲁伯峻先生，我与他胞弟余



修省长(原名鲁广益)的儿子小驹乃幼儿园的朋友，成年后，小驹咧着大嘴给我叙说着鲁氏家族的往事——

他的大爷鲁伯峻乃一九二一年的共产党员，曾与毛泽东、王尽美等在党旗下宣誓。小驹的爷爷追随孙中山先生闹了个名垂青史的辛亥革命。在那个血雨腥风的岁月里，想为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打出一个公平、公正的新世界，让黎民百姓过上身有御寒衣、家有隔夜粮的日子。

王尽美、鲁伯峻走得很匆匆。一九二五年王尽美先生因病故去了，一九二七年鲁先生也被军阀杀害了。苍天不公，英才早逝啊！在山东的大地上，最早共产党的党部便设在如今“制锦市街”的一座老宅里。鲁伯峻的父亲，在院门口挂着律师事务所的牌子。于是乎，王尽美、邓恩铭、鲁伯峻等先辈们都来此处，把大门关紧，留下放哨的，在一闪一闪的煤油灯下，运

筹帷幄着共产党的事业。

五十年前，乍暖还寒时，在墓前我们这帮少先队员，举手盟誓：“沿着革命烈士的足迹，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2015年的清明时节将至，伫立山下，我又忆起四十多年前的事情。英雄山的北坡处，原来是没有植被的。如今济南府六十岁左右的同龄人大概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参与的义务植树。在山的陡坡处，用镐头和铁锹，一下一下地挖着坑，把苍松翠柏的树苗种上，掩上黄土，从山上至山坡传递着水桶，浇灌着干涸的黄土……

于是，英雄山的北坡才有了今天的郁郁葱葱。放眼望去，山北部的革命烈士纪念塔是那么的雄伟挺拔，毛泽东亲题的“革命烈士纪念塔”七个镏金大字，在阳光的照耀下是那么灿烂！